

## 第十九章

---

### 苏军间谍·覆舟事件·司令参禅

“增盛烧锅复仇事件”已经过去两个多月了，并不见尤掌柜的侄子前来寻仇。吃了这么大的亏，料想他们是不会善罢甘休的，但至今一点动静也没有。反倒使我心里忐忑不安。再一想，我江上军威震四方，现在虽然江河日下，但虎死皮犹在，量那姓尤的侄儿不过一个宪兵队的司机，想打我的主意进行报复，恐怕也是老西子拎瓶——打醋（怵）吧。

一天下午，我正要提前下班去上课，有人来电话。勤务兵将电话递给我，只听里边说：“左老兄，你好！怎么多日不见你的影子？近日尽在忙什么呀？”我怎能将军机泄漏，只好用别的事支吾过去，并听出此人是肖宪补肖振中。他说：“今晚我请朋友吃饭，请你作陪。时间定在六点，是恩成饭店。请一定赏光，不见不散。”

我答应着放下电话，心说果然事情来了。这小子不会把我卖了吧？心里一点底也没有，当年二十多岁的我血气方刚，岂能被吓住？死活也得走一趟。于是我假装去上课，告

了假提前回家。临走，翻了一下电话簿查到了恩成饭店的电话号码，悄声告诉大个子班长刘东平在七点左右往恩成饭店给我打电话。他不知何事，但乐呵呵地答应下来。今天的课又不能上了，还得借王升利的笔记大抄一通。

回家躺在炕上竟迷迷糊糊地睡着了。老婆下班回来推我起身去上课，我才发现已是五点半都过了。我对妻子谎说今天不上课，要去丰永家请人鉴定那口日本古刀的年代。说着从衣架上摘下了那落满灰尘的古刀。褪下那紫色的布刀套好一阵拍打，又将刀顺了进去。然后对镜子里那个英俊的小伙子说了声：“挺帅的个小伙子嘛！谁怕谁呀。”抱着刀走出了家门。

一路上我推测着老肖的举动：首先可能是老肖举行的告别宴会。因为最近听说他得罪了哈尔滨市的大恶霸李九爷，似乎是与李九爷的第七个小老婆有染。李九爷一怒之下，找到了宪兵总队武田少佐那里，扬言非要把这小子赶出哈尔滨不可。另一个可能就是增盛烧锅的事了。

恩成饭店的周老板一见我来就热情地迎了上来，亲自把我送上楼去，边走边喊：“肖老爷，客人到了！”

老肖从一个雅间闪了出来，后边跟出一男一女，还有一个缩在后边的人，我一眼认出正是增盛烧锅的尤掌柜。至此，我心中已一清二楚了。经老肖介绍，果然那男的就是尤掌柜的侄儿，宪兵队的司机；那女人是他太太，一个妓女似的娘儿们。这姓尤的年轻人外观倒不像是个横行街里的恶少，身材匀称，面孔也不凶。当然这是在我面前，又是这种场合，否则将是何种面孔倒很难说。

一阵寒暄互相揖让后，我被推在了上首。讨厌的是将那女人安排在了我身边。一阵夹着香水味的狐臭令人欲呕，让

我没法提起什么酒兴来。既然老肖受托替人来打圆场，我当然得给他面子，并顺势下台阶。于是，我抢先来了个开场白：“各位，还有这位尤老爷子，晚辈前些日子少礼了，请多包涵。”那尤老头一见这架势忙和他侄儿一同站了起来，连连作揖回礼：“左兄哪里话，一时的误会嘛！今后大家就是一家人啦！”说罢举酒相敬。那老肖本是帮忙来圆这个场的，应先由他来打开局面，没想到我如此爽快，竟喜出望外，连声叫好。我顺口问了一句：“今天怎么没请那位麻脸先生和泽田伍长来呢？”没等尤老头开口，他侄儿倒先说了：“齐老先生要在家照应，来不了，再说也不好意思。泽田伍长已经调到牡丹江去啦！”噢，原来如此！这个三十来岁的汉子倒心直口快。席间他直言不讳地表明，这增盛烧锅失去了靠山，惟恐我再带人去捣毁他叔叔的买卖。故此，托老肖从中说和，了却这个过节。这时他太太频频斟酒，小尤一再向我称兄，倒弄得我不好意思起来，忙说：“我本人倒无所谓，只是老父亲好喝几杯……尤老兄，看来你很够朋友，今后凡是兄弟这方面的事，不论大小，你尽管来找我，兄弟全包了！”江上军的“虎皮”又被我抖得山响。尤老头儿乐得眼睛变成了一条缝儿。

这时，一个伙计进来说：“司令部的左老爷，有电话。”我知道是刘东平打来的。在门外的电话机旁故意放大了嗓门：“是我，没什么事，一个朋友请客。叫弟兄们放心好了！”这几句话估计雅座里的人全听见了。我大大咧咧地回到座位上。肖振中似深有感触，道：“左老弟有这么多铁杆弟兄，真叫人又羡慕又佩服啊……哥儿们今天借此机会又多交了个朋友（指小尤）。人生在世何处无友不相逢呢，来，干杯！”

我看火候差不多了，有意要告辞。抓起与上衣一块儿放在窗台上的古刀，比画着说：“各位，兄弟有事要先告辞了。内田顾问要等着观赏这口古刀呢。”顺手将刀刃啪地一抽一放，寒光一闪间，几个人全惊呆在那里。我趁机又信口开河吹了个爆：“这口古刀是我老师的传家宝，送给了我。他老人家是关东军的少将。今天，内田顾问向我催了好几次，非要看看这口刀不可……”这几个人一直把我送到饭店大门口。我摆摆手，道声谢，扬长而去。今天，虽然耽误了几节课，但总算把增盛烧锅这块心病给连根清除了，心里不禁十分畅快……

在江上军的历史上，曾出现过这样一位神秘的人物：俄国人“郭索夫”上校。这个黄头发蓝眼珠的俄国人在日本关东军中的特殊地位，神秘的身份和奇特的行动，确是值得记述一下的。

就在江北作业队发生兵变的前不久。一天，我一进办公室就发现副官处来了两个俄国客人，身穿日本陆军军服，上校军衔，坐在副官宫崎和吾妻的座位上。不知当时这些管事的日本人都上哪儿去了，只有一个勤务兵在招待他们。两位俄国人上校看见我肩头一杠三星花的文官肩章，以为我是日本人。其中一个蓝眼珠的上校用纯熟的日语问道：“你是日本人吗？请问丰永少校在什么地方？”我用俄语回答道：“对不起，我不知道。我是满洲人。”这位上校惊讶地扬起眉毛，大声地笑了起来。摸起身边的拐杖在地板上蹭了几下，又改用熟练的汉语说：“啊，原来你小伙子是中国人！真没想到。你在哪儿学的露西亚语？”我立刻用汉语回答他：“报告上校，我从小在哈尔滨长大，一点一点地学的。我正在上的大

学里也有俄语课。”

上校扶着拐杖吃力地站起来，一瘸一点地踱了几步，用汉语自我介绍说：“我叫郭索夫，这位是苏诺洛夫上校。去，领我们找丰永去，小伙子。”我立正向上校鞠躬，这位身材高大的苏诺洛夫点头回礼，满面含笑。

我把他们领到了丰永少校的办公室。丰永正伏在办公桌上写着什么，一见我们进来，马上起立、鞠躬，连说：“您们来了，辛苦了。请坐。”郭上校放下拐杖，动作吃力地坐在了沙发上。我觉得没自己的事情，便鞠躬告退了。

此后，这个郭索夫少校便经常到司令部来，有时竟出入内田的顾问室。日久天长，我才从日本人口中知道了他们的身份。

原来这两个人自称是俄国沙皇军队的士官，是十月革命中逃亡的沙俄贵族的后裔，对苏维埃政权有着刻骨的仇恨。投奔“满洲国国军”后被任命为上尉。曾辗转了全东北十来个省“满洲”军管区，因为其特殊的身份而被日本关东军所倚重。他们经过特殊的考验和训练后，经常被派往黑龙江对岸去进行间谍活动，军衔也逐步被晋升。

“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侵略军进占我国东北，一直趁世界各地多次发生战争危机的机会，在中苏、中蒙边境进行武装挑衅，试图摸清苏军实力，以便决定是北进配合德国攻打苏联还是南下攫取物资的战略。因此，仅在1936年一年中就发生过三十多次边界武装冲突。

1939年春，当苏联正忙于应付渐渐逼近的欧洲战火之时，日本当局决定让关东军再进行一次全面的武力试探，以便为以后的大举进犯做好准备。日军的这个行动，一是想借此提高自己在世界上的“声望”，二是希望以此把苏联和中

国隔开，从而切断中国获得抗战物资援助的通道。其最终目的乃是为了进一步与德国、意大利法西斯势力互相应和、勾结，称霸世界。1937年11月，日本近卫内阁签订了《日本、意大利和德国决定书》，参加了三国“防共协定”。之后，日军大本营又拟定了日、德、意三国加强合作对付苏联的方案，形成了“法西斯轴心国”侵略集团。从此，日本军阀更加有恃无恐了。

“诺门坎事件”是继1938年7月份日、苏“张鼓峰战役”以后的又一次大规模武装冲突。在日、苏战史上称“诺门坎战役”。

1939年5月12日，在满洲的海拉尔西南约二百公里处的诺门坎地区，日军对驻守在那里的大约七百名外蒙古军队进行了突然袭击。猛烈的炮火惊醒了哈拉哈河两岸沉寂千古的荒原，拉开了诺门坎大战的序幕。

根据1936年签订的《苏蒙条约》，苏联政府有责任保卫蒙古不受任何外敌侵犯，更何况日军此次行动的本意就是对苏联进行军事试探，所以苏联不可能不采取军事行动。

苏军著名将领朱可夫受命赴前线指挥这场战役。双方不断增加兵力的投入，从步兵、骑兵到装甲部队、坦克、大炮以至飞机，战役规模越来越大，战斗场面十分惨烈。

日本关东军第二十三师团，师团长小松厚道太郎中将派出了由东八百藏指挥的骑兵首先投入了战斗。郭索夫和苏诺洛夫两名俄国人双双被派入该骑兵队参战。他俩骑术精湛，在骑兵队伍中冲锋在前，十分勇敢，表现非凡。

在一次激烈的战斗中，日“满”联合混成的骑兵队被剽悍的哥萨克骑兵杀得人仰马翻，一败涂地，伤亡惨重。最后“诺门坎事件”以日本关东军的惨败而告终。两个俄国人中，

郭索夫落马摔伤致残；苏诺洛夫被俘（后在交换俘虏时遣返）。事后，日本关东军认为郭索夫中校政治可靠，效忠日本有功，将其晋升为上校。在交换俘虏时换回来的苏诺洛夫也因“英勇不屈”效忠日本被同时晋升为上校，受到特殊的礼遇。为了表彰其功勋，特高薪聘请了一个白俄姑娘当护士，专门为郭索夫上校护理、按摩，任其使用。

但据我观察认定，郭索夫和苏诺洛夫上校是一对儿苏联的国际间谍，那个白俄女护士则是他们的助手、联络员。

郭索夫上校好抽烟，衣袋里经常揣着一种“大白杆”香烟，一到司令部就请大伙抽。到我们副官处时更是“大白杆”满屋飞，我就经常抽到这种劲儿很猛的“大白杆”。而他手中的打火机则大有名堂。我经常看到郭上校在女护士的搀扶下，漫步在司令部门前的栈桥下，频频打火吸烟，而这时，江面上一定有巡航归来的舰队或往返于两岸的运兵艇。每逢江上军有较大行动，他必出现。有时他不在，江沿上则会出现一群花枝招展的白俄姑娘叽叽喳喳地嬉闹或观赏江上风景。不用说，其中肯定有间谍。一次郭上校给我点烟时，我有意无意地假装谦让，想拿过他手中的打火机。但他死不松手，并开玩笑似的在我头上狠狠地弹了个“脑蹦儿”，疼得我直咧嘴。一次本军第一舰队四艘主力舰返航后，第二天，郭上校竟将一个漂亮的白俄姑娘带到司令部来，趁大家都到楼下去吃饭的时候，在姑娘的搀扶下走上三楼大阳台对着江上比比画画，好像在欣赏江上风光。不用说，他那打火机又忙着咔咔地响了个够。

江北作业队哗变事件，当然成了他极重视的情报。事发第二天，他便以慰问的态度出现，凭着一口纯熟的日、汉语言周旋在日本高级军官周围和副官处，既关心又动情地问这

问那，很快就把事情的来龙去脉摸得一清二楚。

我不知出于什么心理，也乐得卖个人情，将自己所知毫无保留地全告诉了他，甚至比向司令官汇报还详细，乐得这个大鼻子直眨眼，将一整盒“大白杆”甩给了我。郭索夫上校从来对我都非常客气。有时和我唠家常，用中国话说：“小伙子，成家没有？挑老婆要仔细哟！要少喝酒，你看那些俄国青年喝酒喝得老二都不好使了……”说完哈哈大笑，一瘸一拐地走了。凭良心说，我对这人毫无反感，反倒暗暗佩服。他们为了自己的国家利益，为了自己的政治抱负出生入死，随时都冒着杀头的危险。身处险境仍能坦然自若，谈笑风生，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相形之下，我不禁万分羞愧而又沮丧，不敢再想……

这位苏联的高级间谍就这样，竟把“鬼子”唬得晕头转向。日本人竟然经常把他派往苏联去执行间谍任务。至于苏诺洛夫上校在交换俘虏时被送回，甭说，那也是苏方的蓄意安排，巴不得将其重派回来呢！

我的怀疑和判断，在“八·一五”光复后得到了印证。苏军进入哈尔滨后，一天，一个偶然的的机会，我竟在江边遇见了这位郭索夫上校。他的军衔仍是上校，但服装却是苏联红军军装，手里的拐杖也没有了，正健步如飞地奔忙在码头上，指挥着士兵抢运码头上堆积如山的战利品。而江上军遗留下來的军舰则成了运输战利品的货轮……壮哉，大鼻子！蠢哉，小鬼子！

那个倒霉的中将司令官李云龙，上任不到半年就被调到牡丹江第六军管区当司令去了。他在任期间的大事就是国兵哗变，弄了个灰头土脸；另一件事他倒办成了，就是将丑侄



女嫁给了老吹张副官（目的是拉拢他，讨好林保治参谋长），此外无所作为。

新来的司令可是个“非凡”人物。姓宪名原，听说是日本陆军大学出身的大清皇族，论辈分比皇上溥仪还大呢。这位司令身材粗壮，短小精悍，一口流利的日语更不在话下。他对日本人不屑一顾。由于他是皇上长辈，又是个日本通，连日本人也不敢小瞧他，处处礼让三分。好在井水不犯河水，倒也相安无事，但后来事实证明，这也是个倒霉鬼。

宪原司令的独特之处，在于他经常足不出户，整天伏在司令室的办公桌上奋笔疾书，俨然大作家神态。一天我去他房间办事，只见他踱步在地毯上，用日语口述着什么。一个四十来岁戴眼镜的日本人正用速记法在记录。我只听懂了最后一句话：“……这就叫做‘禅’。”那个日本人（日本特务机关的密探）记得很快，不时抬头望着他，等待下文。

我当时确实不懂什么叫做“禅”。后来才明白，这位司令原来是位宗教学家，正在潜心修炼，著书立说呢。

为了个“禅”字，我曾经好奇地请教过日本年长的一些人，他们对我的回答都是含蓄莫测的：“禅道是高深的修养，一个人想深悟其中道理那可不容易，你年轻人钻这个干啥？”使我的好奇心颇受冷落。但对宪原司令的学问则产生了敬畏。

位于江上军司令部对岸的一幢二层楼兵营是“训练处”。该机构同江北的“作业队”是兄弟部队，也是新兵教练营地，以水上战斗技术为主课。上校处长姓戴，湖南人。日本人上校叫曾根崎。建制为团级，约一千人。

如按海军训练方式，第一课应先从水兵与水的关系开

始，让水兵熟悉水性，从而征服水，进而达到能在水上作战的目的。那艘老掉牙的炮舰利绥号常年泊在营门外的江面上，就是教练用舰。但是自从改为江上军，由陆军掌握一切教学、练兵方式后，即完全变成了陆军训练课程，忽略了水兵与水的血肉联系，从而酿成了大祸！这批新兵入伍后，三四个月以来一直在陆地训练步兵操典，士兵们下水洗澡、冲凉成了水兵接触江水的惟一机会。

七月的一个星期日，是轮到训练处其中两个连的新兵过江度假的日子。但是这天天公不作美，不但阴云密布，而且江风很大，江面上波涛汹涌，气势澎湃骇人。过江度假理应当机立断停止或顺延，可是值星官日本人大野却犹豫不决。整装待发的新兵们个个兴致勃勃，怀着回家探亲、游玩、会情人等急迫的心理，希望去江南一解多日的苦闷和辛劳，其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举棋不定的大野上尉站在窗前不停地用望远镜眺望江面。那白浪翻滚的江面历历在目，哪有一条小船的影子？就连那些吨位较大的商船也被风浪推得摇摇晃晃、东倒西歪。

日本陆军少尉高山和铃木也轮换着用望远镜向江面瞭望，表情迟疑地盯着大野的脸色，不敢吱声。倒是几个海军出身的士官、助教们叱责着吵吵嚷嚷的新兵，要他们安静等待命令，等待天气的转变。但是这些由市内入伍，归心似箭的新兵们一心向往着与亲人团聚的快乐；而另一些来自附近农村的壮丁们则想到市里去逛逛大街，遛遛妓院、餐馆什么的同样急不可待。

这时，西北天空的一角忽然有阳光透出云层照耀下来，似乎给渡江露出一丝希望。但江面上仍是白雾茫茫，浪涛滚滚。假日的光阴多么可贵，可以说是一刻千金吧！于是，这

杀千刀的鬼东西大野竟下达了命令，让高山、铃木作好渡江准备，发动了两艘俗称为“棺材头”的运兵艇。这两个少尉怎敢抗命，慢吞吞地穿上软木制成的救生坎肩儿，走向了江边。新兵们则不等下令，已排好队伍跟着走出营门，径奔运兵艇而去。一个海军出身的上士班长，见此情景硬着头皮去劝阻大野：“此时渡江，太危险。”得到的回应是：“八卡！服从命令！”

每只运兵艇的定员为三十名。可这些火燎腩似的士兵们竞争先恐后地以每艘七十人的超载量挤满了船舱！剩下岸上挤不进去的五十多个士兵则埋怨、咒骂不绝。在叫喊着快点回来接二班船的呼声里，高山、铃木二人喝止着骚乱，让士兵们坐下来。但由于船小人多，站着都拥挤，哪儿有地方坐？就这样，两艘运兵艇，装载着大大超员的一百四十余名士兵缓缓地开动，摇摇晃晃地驰向了江心，目标是司令部栈桥码头。

这时，太阳又不知躲到哪块乌云后边去了。江面上仍是白浪滔滔。蒙蒙的小雨和着江风，散沙一样击打着船中的人群。而船里的士兵们则互相攀扶着肩头，仰望苍天，毫无惧意，一心想着早点登陆，了却心愿。“棺材头”用中速穿过江中第一舰队，行至宽达八百至一千余米的松花江面的三分之一时，旗舰养民号上发出了连续、短促的汽笛声。这是警告“抢渡危险”的信号。但艇上两个日本陆军少尉哪懂海军的信号，仍指挥着“棺材头”在风浪中挣扎前进。武士道精神的“视死如归”此刻体现得淋漓尽致。

这时，如果站在训练处楼上的窗口，一直用望远镜眺望着的大野立刻用“步话机”命令返航，也就平安无事了，但当时军事装备很落后，哪有这种现代化的通讯工具？只能干

瞪眼瞅着，跺脚捶胸，一筹莫展。第一舰队的汽笛仍在吼叫，“棺材头”仍在顶风冒雨前行。当这两艘运兵艇开至江心时，风浪越来越大，艇身上下颠簸，起伏不停，南北两岸的景物在烟雨中早已模糊一片，什么也看不见了。艇上的士兵这时已惊魂丧胆，互相紧紧搂抱着，心中只剩下一个“老天保佑”的念头了。汽笛声惊动了司令部，众人纷纷抢到窗口，也用望远镜向江面瞭望，艇上险情依稀可见。

这时，一个大浪打来，第二艘运兵艇首先翻沉，七十余人一齐落水。紧接着，前边的“棺材头”里一阵惊叫，整个船身也翻扣江心！霎时间，一百多个黑点挣扎在浪涛中，流散开来，渐渐无声无力地沉没下去。江面上的人头在逐渐减少，十个、八个、五个、三个、两个……最后一无所有了。连那两个身穿软木坎肩儿的日本少尉也失去了踪影。此刻第一舰队的四艘军舰上一片慌乱，凄厉的汽笛声撕破江上雨雾，震惊两岸。许多江边百姓纷纷冒雨拥向江沿，喊声不绝，一片嘈杂：“不好啦！江上军翻船啦……”

司令部值星官猪井少校冒雨站在信号台上举着望远镜，不知所措。此时能见度太差，信号兵手旗失灵。在江面上一片汽笛声中，电信室的值班少尉植田在哆哆嗦嗦地接收第一舰队发来的电讯：“训练处两艇覆江，速救。”猪井接过电讯纸条，脚上穿着草编的拖鞋大喊大叫着跑上了门前的栈桥码头。司令部的汽艇正拴在码头上，但被大伊万锁上了，就是打开锁一时也找不到驾驶员。只有第一舰队已放下四只舢板在舰下转悠，不敢贸然驶向江心。江面上已是一无所有了。风浪仍在肆虐，细雨仍在飘洒。司令部左右的江岸上人山人海，议论纷纷；猪井在电话里对大野破口大骂……

电话打到内田顾问的公馆，日本下女回答道：“老爷、

太太、小姐都出去了，回来立刻报告。”而此时，宪原司令大概还沉迷在他的禅道之中，对惊天动地的大事充耳不闻，确已达到了“超凡脱俗”的境界了。江上军司令部里一片混乱，人人都成了无头的苍蝇。

下午两点多钟才雨过天晴，江面上的风浪渐渐平息。太阳从云雾中露出笑脸，似乎在嘲弄日暮西山的江上军。享受着假日的日本人处长曾根崎三点多钟才气喘吁吁地赶到司令部，在大客厅里见到了懊恼、沮丧的上尉大野，上去就是一顿劈头盖脸的大耳光。然后找来惩罚的士兵用的“绳子夹”（一种缆绳头）向大野的头上、肩上、后背猛抽起来，直到筋疲力尽。大野口角流血，站在那里像一截栽在土里的木桩，一动不动。养民号舰长高木中校算是在场人中资格最老的一个了，上去好言相劝，让曾根崎息怒，等内田顾问回来再行定夺。

由于这天是星期日，江北作业队和第一舰队都有士兵登陆的例假，但因为天气原因都已取消或顺延了。惟独训练处干出了这个后果惨痛的蠢事！这一百多条人命谁来负责？

直到下午五点多钟，内田顾问，这个江上军的“太上皇”才打来电话。首先由曾根崎向内田顾问详细地汇报了事情的一切经过。耳机旁围着所有的日本高级军官。一个个伸长了脖子竖着耳朵听“圣旨”：第一，作业队的高桥少校立刻回队组织人员和绳网，在东江桥下游张网，并设立帐篷，日夜打捞顺流而下的尸体，就地焚烧；二，曾根崎、大野立即返回江北训练处，安抚军心，封锁消息，并停止士兵登陆休假；三，第一舰队协助“作业队”工作，派出兵员和舢板巡视江面和东江桥一带打捞浮尸；四，其他琐项明天上班后再议。电话卡嚓一声挂断了。众人立刻分头行动。

最后离开司令部的是处长曾根崎和上尉大野。两个人登上小艇驶向江北时，残阳如血，已染红了松花江水；呜咽的江风中似乎夹杂着溺死冤魂的哭泣声。大野立在船头面对这日本人垂涎八尺的满洲河山，突然爆发出狼嚎般的狂笑：“啊——哈哈哈……”猛地抽出腰间大战刀，双手紧握刀柄，刀尖对准胸口，从前腹刺透后背来了个透心凉！站在他身后的曾根崎对着摇摇欲倒的大野，上去就是一脚，扑通一声将大野的尸身踹入了江心……

据说大凡溺死的尸体，都要经过二十多个时辰才能漂浮上来。第二天是星期一，司令部里一片忙乱，日本军官们楼上楼下的奔跑声、传达命令声和频繁的电话铃声大作。江北作业队在东江桥下张网捞尸，日夜不停，抛锚在江心的两只运兵艇，到夜间灯火四射扫视江面，大呼小叫一惊一炸地忙活。这么大的惨剧，要想封锁消息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其实事故发生的当时老百姓就看到了，不久就传遍了全市。

我刚刚向宫崎副官简单地讲完了我所了解的情况，对门的情报处长丰永就把我叫去问这问那，我只好又如实地汇报了一遍。这天我成了大忙人，奔波在日、“满”官兵中间，传达命令，翻译对话。军法处，面孔森严的涩谷少校也把我叫去，好像要从这里咨询与沉船事件有关的法律方面的问题。确实此事案情重大，但原因既简单又明显，全都一目了然，何必问我？

作业队传来消息，当天下午就打捞上来十几具尸体。在满洲大地上“第二次露面”的日本鬼子这回真变成鬼了。高山、铃木的尸体首批被打捞上来。他们仍穿着救生坎肩儿，但一个头皮骨破裂，另一个胸部肋骨骨折。按说溺死者不应

有这么重的致命伤啊，何况其他“国兵”尸体绝大多数是溺毙，少有外伤的。此事至今仍是一个难解之谜……这两个三年军校毕业，一当上少尉就向士兵们乱施淫威的东西，此时“大和魂”不知飘向了何方。他们的尸体和其他陆续打捞上来的“国兵”尸体都在内田顾问的命令下被作业队就地火化了。一个多星期之内，太平桥一带的老百姓都能看到远处沙滩上冒起的滚滚浓烟，嗅到随风飘来的刺鼻的焦臭味儿。

作业队最后收兵不见大野的尸体出现，大概这个鬼子没脸露面来向天皇报告事件始末吧。此次沉船事故中除死亡的三个日本人以外，共溺死青年“国兵”一百零五名（焚尸数字），失踪三十余人。只有两名奇迹般的生还者，皆为老海军的上士班长。其中一个叫马连云的人我认识。这人从小在松花江边长大，入伍前就能只身泅渡大江两岸，水性极佳，是水兵的游泳教练之一。他落水后顺流而下，游了约一个小时，最后终于在东江桥附近登上了南岸。试想，如果这批新兵入伍后就进行泅渡训练，翻船后的幸存者理应更多。唉！

丰永少校曾再三叮嘱我注意军中言论，事故原因不可对外泄漏一个字。我口中唯唯诺诺，心说：废话，纯属掩耳盗铃！

下午，郭索夫上校又一瘸一拐地出现在司令部里。先是一头钻进丰永少校的情报处，良久才走出，到副官处又与宫崎聊了起来。“大白杆”香烟的辛辣味很快又弥漫了整个房间。听了宫崎的情况介绍，郭索夫又拄着拐杖走上平台，望着平静的松花江掏出了手帕，大声地抽搐几声鼻腔，似乎万分伤感。我注意到，这回他没使用打火机，江面上也确无可照之物了。但我敢肯定，当天晚上或者明天，黑龙江对岸的海兰泡或伯力城将收到他的密电，然后转呈莫斯科，将满洲军事力量的又一次削弱，报告给苏军最高统帅部了。

覆舟惨案发生的第二天下午，江上军原司令官尹祚乾突然出现在司令部。听到瓦斯汽车的声音，我隔窗望见了他的身影忙起身相迎，但他只是冲我点点头，满面肃容，一言不发，径向楼顶平台上走去。

在三楼的大平台上，面对着浩瀚的松花江，一身戎装的老司令摘下军帽捧在胸前，立正站着，良久，两行老泪夺眶而出……我明白，这位老军人是在临江凭吊昨天遇难的一百多名弟兄，他心中的悲痛和愤怒可想而知。

江上军可以说是他一手创建起来的。如今，他刚刚退隐就发生了这么重大的死亡事故，这是江上军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兵员损失啊。

远处太平桥江坝上焚尸的黑烟隐约可见，江风呜咽，似有无数冤魂在向尹司令哭诉、呼喊……我发现退隐后的尹司令似乎苍老了许多。足有半个来小时，他才长叹一口气，冲着大江深深地鞠一躬，然后才转身下楼，登车离去。从始至终，一句话也没和任何人说……

有“皇族血统”的宪原司令，对近来发生的重大事件，竟毫无反应，可以说是不闻不问，仍在“禅”的世界里漫游。那个以记者面目出现在司令部为他作速记的日本特务，近来又经常在情报处进进出出，引起我的注意。一天宪原司令碰巧见到我在办公桌上练习书法，大感兴趣，竟命令我用大提斗笔给他写一个二尺见方的“禅”字。我只好立刻答应下来，但却一直没有动笔。主要是因为自己对“禅”一窍不通，本来书法水平就不高，如果再写个自己毫不理解的东西，肯定无笔锋，少神韵，还是别贻笑大方了吧。后来司令



大概也忘了这回事，再没提起过。其间，司令办公室常有穿道服或素装的术士和江湖人物走动。同时，还有一个四十开外的“满洲”妇女经常来找宪原司令。这女人相貌一般，服饰普通，但神态文雅、娴静，对人谦恭有礼，被卫兵领进司令室后，一坐就是一下午，不知在搞些什么名堂。这情况引起了丰永少校的关注，曾一再对我明示：密切监视。明察暗访宪原司令室内的一切动态，及时向他反映。那年代没有窃听器那类玩意儿，我上哪儿了解情况去？只好口头敷衍了事。何况这位“皇族”连日本人都惧他三分，丰永少校也经常被他用纯熟的日语骂得狗血淋头，我一个小小文官惹他做甚？丰永几次三番向我软硬兼施，又是严厉探问，又是请我吃饭，我一概支吾搪塞了事。

不知何时，消息到底透露给了宪原夫人。这位五十多岁，身体肥胖的夫人多次来到司令部向内田顾问和林参谋长哭诉，告状，都被劝了回去。这一来，那神秘的女人果然不再露面了。于是宪原司令便有点失魂落魄，常常一个人在司令室外的走廊上来回踱步，自言自语，一晃就是一个来小时。路遇下级军官向他敬礼他也好像没看见；就连内田顾问、林参谋长走过，也熟视无睹，中邪一般。一天，我在副官处门口碰到他正在踱步，清楚地听到他嘴里念叨的字句是：“真的吗，是真的吗？妙啊妙！”一边将手指捻出响来。我如获至宝似的将这一发现如实汇报给了丰永少校。这家伙像得到什么重大情报似的，兴奋异常，连说：“左君辛苦了，再努力干，亏不了你的！”其实这几个字哪有什么情报价值。而宪原司令身上的谜至今仍无人能解，白白忙坏了日、“满”的情报机关。后来，这位研究禅道走火入魔的司令，其禅学著作是否问世也没人知道。